

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
學者權威之作

錢中文、劉方喜、

吳子林——著

中國現當代 文學論爭中的 理論問題

中國現當代文學論爭中的理論問題

作 者 / 錢中文、劉方喜、吳子林

主 編 / 蔡登山

責任編輯 / 劉 璞

圖文排版 / 王思敏

封面設計 / 秦禎翊

發 行 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76 巷 65 號 1 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09 號 1 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 114 內湖區舊宗路 2 段 121 巷 19 號（紅螞蟻資訊大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3 年 6 月 BOD 一版

定價：500 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2013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中國現當代文學論爭中的理論問題 / 錢中文, 劉方喜, 吳子
林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2013. 06
面 ; 公分. -- (文學視界 ; PG0976)
BOD 版
ISBN 978-986-326-114-8 (平裝)

1. 中國當代文學 2. 文學評論 3. 文學理論

820.908

102008943

目次

第一章 自律與他律	
——20 世紀 30 年代中期前文學觀念之爭	5
第二章 斷裂與賡續	
——新詩的歷次論爭及其理論的闡釋與重建	79
第三章 分流與融合	
——雅俗文學的流變	135
第四章 先鋒與回歸	
——現代派之爭及其發展	189
第五章 語言與圖像	
——圖像藝術與語言藝術的前景	247
第六章 民族與世界	
——文化「一體化」、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問題	289
第七章 文化與文論（一）	
——全球化語境與文學理論的前景	327
第八章 文化與文論（二）	347
後 記	381

中國現當代 文學論爭中的 理論問題

錢中文、劉方喜、
吳子林——著

目次

第一章 自律與他律	
——20 世紀 30 年代中期前文學觀念之爭	5
第二章 斷裂與賡續	
——新詩的歷次論爭及其理論的闡釋與重建	79
第三章 分流與融合	
——雅俗文學的流變	135
第四章 先鋒與回歸	
——現代派之爭及其發展	189
第五章 語言與圖像	
——圖像藝術與語言藝術的前景	247
第六章 民族與世界	
——文化「一體化」、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問題	289
第七章 文化與文論（一）	
——全球化語境與文學理論的前景	327
第八章 文化與文論（二）	347
後 記	381

第一章 自律與他律

——20 世紀 30 年代中期前文學觀念之爭

中國的文學理論作為一門十分年輕的學科，起步比較晚。近一百多年，是中國文學理論走向現代化的時代，不斷地加深認識、建設的時代，但作為學科的建設，卻經歷了十分曲折的道路。在這一曲折的過程中，有過自由探索文學觀念的階段，出現過多元的文學思想並存、爭鳴的階段，同時也有過力圖一統文學觀念的階段，被政黨、行政力量進行嚴格規定以至對持不同文學觀念者進行大規模清剿的階段，到當今復歸於多元表述的階段。

文學觀念的不同探討、表述、論爭，從主導方面看，實際上是在現代歷史精神的追求中進行的。近、現代歷史追求的意向，就是一種反對封建等級、專制殘暴、落後愚昧的現代意識精神，它通過對科學、民主、平等、自由、理性、人道、法制、權利的普遍肯定，實施與完善，體現為一種不斷走向科學、進步的理性精神與啟蒙精神，一種高度發展的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

一百多年來，文學觀念的演變，正是在現代性的策動下進行的。現代性固然表現為一種普遍原則，但是在不同時代其內涵不盡一致，同時在不同集團、不同個人那裡，表現又各有差別，以致出現了多種文學觀念。但是文學觀念的主導旋律，則是啟蒙與救亡。

百多年來文學觀念的現代化進程，大致可以分為幾個時期。

一、1840 年前後的萌發狀態，文學觀念開始脫離千年傳統而表現了其新的時代意向。但就其形式而論，文學理論仍是原有的傳統詩論；詩論話語也是傳統的話語。

二、19 世紀末、20 世紀初，既出現了從傳統詩論轉向現代文論短暫的過渡期，又出現了文學觀念現代化的首演。這種結合，在梁啟超、王國維身上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現。梁、王二人，既是傳統詩論的繼承者，又是現代文論的開創人。梁啟超的文論，既有傳統詩論，同時又發揚了傳統中的政治教

化精神，與引進過來的西方文學觀念相結合，直接以啟蒙與救亡為導向，顯示了其強烈的現代性特徵，於是過去詩論中那些經常使用的概念，現今被適應當代生活需求的文學觀念所替代了。王國維也是如此，他既吸收了西方美學思想的極為高妙的詩論，同時也引進了當時正在逐漸走向主導的西方文學觀念，從而又從另一個方面，極大地改造了中國原有文學的觀念。此外還出現了符合文學自身特徵，但是由於與啟蒙與救亡有一定距離，而後來常常受到主導文學觀念的擠兌與打擊的現代性文學觀念，不過一旦時過境遷，卻顯示了其無限的生命力。可以這樣說，這時期的文學理論，無論從內容到形式，都是從傳統向現代的躍進，體現了文學理論現代性的重大轉折。

在這過程中間，文學理論的話語急劇地現代化了，隨著觀念的根本性轉變，於是舊有的詩論一改而為現代文論，隨想、感悟式的文字，一變而為分析的、邏輯的論說性文字。原有的一套理論話語，一變而為現代文論話語，當然，實際上大部分是從西方引進的文學理論話語。

三、「五四」文學革命和文學轉型時期，創建了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新文學，文學觀念顯示了現代性的突進。但是，新文學的突進運動，由於存在著相當程度的激進情緒，而使得正在發展起來的文學理論現代性，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而 30 年代革命文學、無產階級文學的大辯論，使文學公開轉向政治化，認為文學藝術本身就是政治的一定形式。

四、隨後近 40 多年間，文學觀念現代性的激變與分化，出現了將外國的文學觀與傳統的政教精神合而為一的過程，並被一定時期的社會勢力將傳統文學的政治教化作用發展到了極端，強加給了文學不堪忍受的生命之重，以致嚴重地脫離了它自身的軌道，阻礙了它自身的發展，顯示了現代性的曲折軌跡，最後發展到了現代性的崩潰與反現代性。

五、20 世紀 70 年代末以後文學觀念現代性的多元發展趨向，成了主導趨向。

文學觀念現代性的發展，自然也應包括文學語言的現代性的演變，這是文學觀念現代性的應有之義。

本章主要討論 20 世紀 30 年代中期前中國現代文學觀念的演變。

第一節 現代性的反思、批判與文學觀念的現代化需求

文學觀念的變革從來是先由內因造成的，雖然這動因有時十分隱蔽。

文學作為文學，是由文學作品的流傳與接受而獲得生命。唐宋以前的文學，包括那些偉大作家的作品，固然為我們留下了不少千古絕唱。白居易的詩歌據說平民老嫗都能背誦，佛教的寶卷的宣唱，產生了文學的新形式，贏得了低層廣大的聽眾，但那些詩人們的詩作，主要還是在士大夫之間傳播，文學的主流是朝廷、士大夫們專有的詩文，流傳於民間的作品不算很多。到了宋代，詞的興盛向民間有所靠攏，勾欄瓦舍的演唱、娛樂，不管怎麼說，使文學走向了市民與下層，接受面較為寬廣。元、明、清時期的戲曲演出日益增多、改用白話寫的小說得到長足的發展，使它們擁有眾多的普通百姓與識文斷字的市民。雖然詩文仍然被奉為文學的正宗，但它們同過去一樣，只限於在宮廷、官僚、文人中間流行。隨著城市的繁榮與變遷，小說、戲曲的數量日益增多，這些廣為流行的文學樣式，形成了足以與詩文相抗衡的真正的文學潮流而激動於民間。

現代性的反思與批判是互為依存的，它們都指向傳統文化中的保守、落後的一面。現代性的文化反思與批判，引起了審美現代性的演變，新的審美話語的產生，文學文體的新生，新的文學觀念的形成。

早在 1840 年以前，有識見的中國文人就已看到清王朝由盛世而轉向國運衰微和「衰世」的來臨，他們懷著一種憂國憂民的意識，奮力著述，痛陳社會弊端，要求改革政治。及至 1840 年之後，中國訂下了不少喪權辱國的城下之盟，喚醒了不少有識之士的自救圖強的願望，而把目光注向西方。人們介紹並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聲光、電化、重學、開辦鐵路、發展礦務實業等，同時也要求政治、體制的改革；隨著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外出文化考察與西方文化的輸入，使得人們開始對世界整體局面有所瞭解和認識。各種社會勢力的鬥爭與權力的爭奪，發展到極其殘酷的地步。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裡講到：

「鴉片戰役」以後，志士扼腕切齒，引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經世致用觀念之復活，炎炎不可抑。又海禁既開，所謂「西學」者逐漸輸入；始則工藝，次則政制。學者若生息於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窺，則粲然者皆昔所未睹也；還顧室中，則皆沉黑積穢；於是對外求索之欲日熾，對內厭棄之情日烈。欲破壁以自拔於此黑暗，不得不先對於舊政治而始奮鬥；於是以極幼稚之「西學」知識與清初啟蒙期所謂「經世之學」相結合；別樹一幟，向於正統派公然舉叛旗矣。¹

這裡十分生動地描述了一批有所覺悟的士大夫階層人物，見到外面世界的開化與進步後所持的清醒態度。開啟民智、救亡圖存那種深沉的憂患意識，正是中國近代這一階段現代性的主要內涵。19世紀末的維新派的文學革新運動所導致的文學觀念的更新，是由19世紀40年代前後詩文評的思想內在的變化所準備了的，文學自身的發展，已積聚了變革的深刻的動因，同時由於中西文化與文學的交流與碰撞，也就進一步促成了這一時期中國文學觀念和文學深刻的變化。

在雜文學的時代，中國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往往是一身而兼任的。因此，他們的政治主張常常包含了他們的文學觀念，他們的文學觀念也常常表達了他們的政治理念因素。龔自珍宣導的「尊情」說，表達了對家國不振的憂患之情。魏源則提出文外無道、文外無治、文外無學、文外無教，強調的是文與詩的治國教化功能。相同的意思黃遵憲在《人境廬詩草》自序中也說過：「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²。王韜廣泛接觸西學，改革之願望自然強烈，在文學方面，他反對模仿前人，提倡「自抒胸臆」，要表述詩人面向殘破家園的憤鬱之情。他針對桐城派的詩文說：「余不能詩，而詩亦不盡與古合；正惟不於古合，而我性情乃足以自見。」今之所謂詩人，「宗唐祧宋

¹ 《梁啟超文選》下，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第246-247頁。

² 黃遵憲：《自序》，見《人境廬詩草箋注》，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第1頁。

以為高，摹杜範韓以為能，而於己之性情無有也，是則雖多奚為？」³嚴復接觸的西學面甚廣、甚深，熱望科學、民主，用西學實用的目光，反對八股，痛陳弊端，批判過去的文化、政教典籍。在 1895 年，直接提出在此「救亡危急之秋」，就中土學術的使用價值來說，「曰：無用」。在《詩廬說》中說：「詩者，兩間至無用之物也。饑者得之不可以為飽，寒者挾之不足以為溫，國之弱者不以詩強，世之亂者不以詩治。」「詩之所以獨貴者，非以其無所可用也耶？無所可用者，不可使有用，用之失其真甚焉。」他對當時詞章的評價，極為激烈，認為詞章與經濟殊科，詞章不妨放達，故雖及蜃樓海市，恍惚迷離，但足可「移情遣意」，「得之為至娛，而無暇外慕」，所以「非真無用也，凡此皆富強而後物富民康，以為怡情遣日之用，而非今日救弱救貧之切用也」，但一旦賦予其「事功」，則「淫遁詖邪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矣。苟且粉飾，出乎其政，害於其事矣。而中土不幸，其學最尚詞章」⁴。其「用」與「不用」之說，是很有見地的。

就是過去被視為保守落後的、反對變革的一批人士，也感覺著世道之變，不可避免地他們的文學主張中顯示出變化來，如桐城派諸人。

同時文字語言的改革也提上了日程，文學話語的更新，必然組成文學現代性體現的重要部分。黃遵憲作為維新改革派的人物，在宣導詩歌語言改革方面，十分著力。早在 19 世紀 60 年代末，就反對崇古因襲，提出了詩歌因時代而變的改革的主張：

我手寫吾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為古爛班。⁵

³ 王韜：《蘅花館詩錄自序》，《弢園文錄》外編卷七，中華書局。

⁴ 嚴復：《救亡決論》，《直報》天津，1895 年，5 月 1-11 日。見《嚴復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 557 頁。

⁵ 黃遵憲：《雜感》，見《人境廬詩草箋注》，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年，第 15-16 頁。

他主張文字與語言的合一，以減少閱讀的困難。從時代的變遷出發，他說「今之世異於古，今之人亦何必與古人同？」談及語言與文字關係時，他說：「言有萬變而文止一種，則語言與文字離矣。」然而離則如何？

蓋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其勢然也。

周、秦以下，文體屢變，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諭批判，明白曉暢，務期達意，其文體絕為古人所無。若小說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筆之於書者，則語言文字幾幾乎復合矣……欲令天下之農工商賈婦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於此求一簡易之法哉！⁶

在要求語言與文字合一以適應現代化的需求，趨向口語，大概表現的最為明白的了。這樣就出現了審美現代性與漢語現代性的交叉問題。

19 世紀後半期，一面是西學東漸，一面是走出國門，這導致中西文化的相當廣泛的交流與瞭解，包括對外國文學的認識。開始有了外國文學的翻譯。其中有通曉法文的陳季同，不僅將中國的一些劇作翻譯出去，用法語寫作介紹中國文化，同時對於外國文學特別是法國文學的瞭解也十分深入，並有獨到的見解，提出中國文學要介紹出去，外國文學要翻譯過來，形成一種當時聞所未聞的「世界的文學」觀，我們在後面還將談及。

政治、文化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海禁的打開、外國文明的輸入、自救圖強的強烈願望，引起了整個思想界的深刻反思、批判與更新的要求。到了 19 世紀末，終於形成了文學文體現代化的一次首演。首先是小說，然後是戲曲，再後是通俗文藝，成為文學中的主導走向，而把原來的傳統詩文，排擠到了邊緣，形成了其曲折的走向。

⁶ 黃遵憲：《日本國志學術志二文學》，《中國歷代文論選》第四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第 117、118 頁。

第二節 現代性與文學觀念多元表述與論爭

1897 年，嚴復、夏曾佑在天津《國聞報館附印說部緣起》一文中，縱論古今中外、歷史演化，最後談到「說部之興其入人之深，行世之遠，幾幾出於經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風俗，遂不免為說部之所持」。他們認為小說對於西方和日本在開化發達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且聞歐、美、東瀛，其開化之時，往往得小說之助。」附印說部緣起，目的在於「使民開化。自以為亦愚公之一奮，精衛之一石也」⁷。

戊戌政變之前，康有為、梁啟超主要寄希望於政治變革，為此積極奔走、呼號、上書清帝，採天下之輿論，取萬國之良法，推行新政，明定國是，革舊維新，以救時艱。還在 1897 年，康有為就看到小說在啟發民智方面，有非凡的作用。在《日本書目志》識語中他提到，僅識字之人，有不讀經的，但無有不讀小說者。於是提出：

六經不能教，當以小說教之；正史不能入，當以小說入之；語錄不能喻，當以小說喻之；律例不能治，當以小說治之……今中國識字人寡，深通文學之人尤寡，經義史故，亟宜譯小說而講通之。泰西尤隆小說學哉！⁸

1898 年，維新改革遭到了反動封建勢力的鎮壓，康有為不得不流亡日本。1900 年，康有為得知友人欲效梁啟超撰寫以戊戌變法為題材的小說時，贈以一詩《聞菽園居士欲為政變說部詩以速之》，講述了他過去在上海書肆的考察情況，瞭解到書肆銷售情況：書經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說，小說通於

⁷ 原載天津《國聞報》光緒 23 年（1897 年）10 月 16 日至 11 月 18 日。

⁸ 康有為：《日本書目志》，見《康南海先生遺著彙刊》（十一），臺灣宏業書局，1976 年，第 734 頁。

俚俗，讀者最多。康有為在贈詩中談到小說發展的勢頭，以為小說發展之盛，足以與六經爭衡：

我遊上海考書肆，群書何者銷流多？經書不如八股盛，八股無如小說何……方今大地此學盛，欲爭六藝為七岑。⁹

說今天小說的地位已大大增高，可與六經爭衡而並列為七。嚴復、陶佑曾、康有為等人，極大地提高了小說這種文體在文學中地位，使小說堂堂正正地成了文學的主潮。同時在儒家的「文以載道」、「經世致用」之說的理論基礎上，竟認為小說可以與六經平行，替代正史、語錄、律例了。

梁啟超在文學話語、文體現代化進程中無疑起著重大的作用。早在 19 世紀末的最後幾年，就力主改革舊文體，嚴厲批判八股文體，反對言文分離，繼黃遵憲等人之後，進一步宣導言文一致的「新文體」。1897 年他任職湖南時務學堂時，在堂約中就提出要做「覺世之文」。對於覺世之文則要求「辭達而已矣！當以條理細備，詞筆銳達為上，不必求工也」。他通過編辦報紙、編輯寫作的實踐，創造了一種通俗易懂的報章「新文體」，而風靡中國報界、學界。後來他自己概述這一經歷時說，為文：

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感情，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¹⁰

梁啟超的宣導與身體力行，使得半文不白的「新文體」推行開來，作為向白話文的過渡，有力地推動了文學的白話化運動。

⁹ 《南海先生詩集》卷五《大庇閣詩集》，商務印書館民國三十年版（崔斯哲手寫）。

¹⁰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文選》下，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 年，第 252 頁。

在《變法通議》的《論幼學第五·說部書》(1896年)裡，梁啟超就談及書經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說的閱讀情況，即康有為在上海書肆所做的考察。同時宣傳日本之變法，多賴小說、俚歌之力。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出走日本，辦《清議報》，本著小說可以為政治改革服務的目的，著手翻譯早已過時的日人政治小說《佳人奇遇》，並親自作序，即《譯印政治小說序》一文，著力提倡政治小說。在這篇序文裡，梁啟超引用了康有為在《日本書目志》中所談及的小說的作用與讀者閱讀之傾向，強調了政治小說在影響普通百姓精神中的作用，並同意外國學者把小說視為國民之靈魂。他說：

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經歷，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於小說。於是彼中級學之子，黌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僧、而農氓、而工匠、而車夫馬卒、而婦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¹¹

他在這篇序文中，對中國傳統小說做了評說：認為中土小說，佳制蓋鮮，「述英雄則規劃《水滸》，道男女則步武《紅樓》，綜其大較，不出誨盜誨淫兩端，陳陳相因，塗塗遞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

接著，梁啟超在他1902年創辦的《新小說》創刊號上發表了《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此文一開始就把過去說的兵丁、販夫走卒、農氓工匠，統統視為「一國之民」，認為「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這小說之不可思議的支配人道之力，就在於小說「常導人遊於他境界，而變換起常觸常受之空氣者也」；能寫盡人

¹¹ 梁啟超：《譯印政治小說序》，原載《清議報》第一冊，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十一月十一日刊。